

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牛婷婷,汪永平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寺庙建筑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以平面形制为出发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发展历程。萌芽期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由大唐和尼泊尔同时传入藏地,寺庙建筑作为外来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受到了来自汉地、印度和尼泊尔等佛教文化发达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此时的寺庙建筑平面形式以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为主;发展期主要是后弘期开始的前四五百年时间,随着佛教文化与藏地文化的融合,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雏形,就是“前堂后殿”和“前堂侧殿”形式的出现;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寺庙形式趋于成熟定型,三段式的平面布局,“前堂后殿”式成为平面形制的主流。

关键词:藏传佛教;寺庙;模仿;定型

中图分类号: TU-098.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3-0029-06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Temple's Plane Form

NIN Ting-ting, WANG Yong-p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With a range of ca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lane form of Tibetan Buddhism temples. The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temples has passed three stages: the embryonic, the developing and the mature. The first stage, the period of Tubo Dynasty when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Tibet from Tang Dynasty and Nepal, witnessed the growth of temples from nothing. Influenced by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developed regions with Buddhist culture such as Tang Dynasty, India and Nepal, the temple's plane form was an imitation of Indian temples. The developing stage began in the first 400—500 years of the second diffusion of Tibetan Buddhism.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 Tibetan culture, Tibetan Buddhist temple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ir own prototype, hence the forms like the antechamber with the back halls or the antechamber with the side halls. As the Gelupa gained momentum, temples got into a fixed form and the three-section plane and the antechamber with the back halls prevailed.

收稿日期:2011-01-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0678082)

作者简介:牛婷婷(1982-),女,安徽巢湖人,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遗产保护与理论。

Key words: *Tibetan Buddhism; temple; imitation; fixed form*

寺庙作为西藏地区保留最多的传统建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随着藏传佛教由外来文化到本土文化的转变,寺庙建筑的平面形制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

一、萌芽期(公元7世纪—公元9世纪)

公元7世纪,赞普松赞干布从唐朝和尼泊尔迎娶两位公主,希望通过这种联姻的方式将先进的文化带到当时相对落后的吐蕃,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来削弱苯教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安放两位公主从各自国家带来的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释迦牟尼像,赞普主持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这两座建筑是有史料记载的西藏地区最早的佛教建筑,虽然它们被冠名为“寺”,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寺,仅仅是供佛的房子,只有“佛”因而只能称为“佛殿”。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崇佛,并且懂得堪舆之术,经她测算,吐蕃的疆域很像是倒卧的魔女,为了镇妖除魔,她主张在魔女的心脏和四肢的位置修建“寺”,用无上的佛法来降伏魔女,大昭寺的位置就是在罗刹女的中心位置。小昭寺的修建与镇压罗刹女的传说并无直接的关联,相传文成公主在前往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时,经过今天小昭寺所在的位置,拉运佛像的车陷到了泥里,无法前进,索性在此地修建佛殿用于供奉唐朝来的佛像。虽然依文成公主的堪舆而修建寺庙的说法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些寺庙的位置大多是位于蕃民聚居的地区,可见赞普宏扬佛法的决心。

公元763年^①,赞普赤松德赞举全境之力,历时12年修建成西藏的第一座“佛、法、僧”三宝^②俱全的寺庙,赐名桑耶龙吉柱寺,也有的史书上称

其为白吉扎玛尔桑耶米久伦吉扎巴寺。桑耶寺的建立,在藏传佛教历史和藏族建筑史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改变了吐蕃没有寺庙的历史,标志着佛教在吐蕃已经生根发芽,此后,汉僧、印僧以此为据点,开展了更为广泛地传经说教的活动。

赤热巴巾是赞普赤德松赞的继位者,也是吐蕃历史上著名的“祖孙三法王”^③之一。赞普本人被认为是“一位极度崇佛和侍奉佛僧的国王”^{[1]187},在他执政的四十余年间,吐蕃的僧侣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僧人的权利也极度膨胀,他制定了“七户养僧制”,并给予信奉佛教的人诸多赦免,除了这些在他的促进下寺庙建筑的维修和营建活动也很频繁。“赞普笃信佛法,在蕃地建修行院、讲经院和戒律院等数十座。并令汉地及藏区、热巴巾王辖区的所有人,修建拉康(神殿)千座、佛塔十万尊”^{[1]189}。在《西藏王统记》中,有提及在赤热巴巾时期曾在拉萨古城大昭寺附近修建了六座佛殿,“又王之受供僧娘·霞坚及少数臣僚等在拉萨东面建噶鹿及木鹿寺,南面建噶瓦及噶卫沃,北面建正康及正康塔马等寺”^{[2]137}。其中“木鹿寺”和“噶瓦神殿”就是现在的木如宁巴寺和惜德林寺的前身。

公元838年,郎达玛继位成为吐蕃王朝最后一位赞普。在他掌权期间,对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无数的寺庙被毁,僧侣被迫还俗,刚刚在吐蕃发展萌芽的佛教进入了长达百年的黑暗期。

大昭寺是西藏历史最为悠久的佛教寺庙,也是藏学家和古建筑学者研究的重心。多年来,关于大昭寺建筑发展情况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宿白先生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中对大昭寺现有建筑进行了分期,并指出第一时期即松赞干布时期修建的中心佛殿的形制模仿了印度寺庙,“上述平面布局为西藏佛寺所仅见;亦与内地

①对于桑耶寺修建的具体年代,史学界一直颇有争议,这里参考的年代来源于刘立千先生对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一书的注释。

②“佛、法、僧”是佛教三宝,佛宝指圆成佛道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宝指佛的一切教法,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僧宝指依佛法如修行、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出家沙门。也有人认为,具备神权统治、经律教义和严密组织是“三宝”俱齐。

③是在吐蕃王朝时期,对佛教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三位赞普,松赞干布将佛教引入吐蕃,赤松德赞确立了佛教在西藏社会的地位,赞普热巴巾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推到了一个高峰,此三人被后世并称为“祖孙三法王”。

佛寺不同,与它极为类似的是印度佛寺建筑中的毘诃罗。……和大招寺中心佛殿最接近的是位于北印度巴特耶县巴罗贡村的那烂陀寺僧房院遗址”^[3]。

很多学者认为,桑耶寺才是西藏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佛教寺庙。据《拔协》记载,主持寺庙修建的莲花生大师向赞普赤松德赞承诺,“要把这座白吉扎玛尔桑耶米久伦吉扎巴寺修成符合所有经藏、律藏、论藏和密宗规格,在世界上威德最高,无语伦比的寺庙”^{[4]28}。最后这座寺庙效仿了印度噢登布山上的寺庙(即欧丹达布梨寺)。修建,以须弥山、四大洲、日月、小洲等为蓝图,从一个兔年到另一个兔年,桑耶寺的修建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整个寺庙将理想中的佛国世界香巴拉具象化的展示在了世人面前:乌孜大殿象征着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乌孜大殿周围的四座佛殿象征着海上漂浮的四大神洲;四大佛殿周围的八座小佛殿象征着八小洲;乌孜大殿旁边的两座小佛殿象征着日和月;主殿四角还有白、黑、红、绿四座佛塔,镇刹凶魔;在大佛塔的周围有108座小塔,金刚杵形,每杵下都置有舍利一枚,象征佛法坚不可摧;寺庙的最外圈是椭圆形的围墙,象征牢固的铁围山(见图1)。



图1 桑耶寺鸟瞰照片

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发展到今天,主要可以分为蚌巴、日追、拉康、旦康(嘎巴)、贡巴这几种类型。其中“贡巴”指的就是像桑耶寺这样佛、法、僧俱全的完整寺庙,而拉康指的则是一种规模较小的建筑,相当于佛殿。吐蕃王朝时期创建的寺庙,以拉康居多,大、小昭寺还有十二镇妖寺都是这一级别的寺庙。佛殿的主要形制特点是规模

较小的方整空间,被室内转经道包围,内室面积多为2—4柱。小昭寺修建于吐蕃时期的部分就是一层的佛殿,佛殿方形,内室面积2柱,外围有转经道;乃东县的玉意拉康是松赞干布时期修建的四大镇边寺之一,同样的方形平面,被转经道包围的内室;公元8世纪修建的木如寺也是拉萨著名的古寺之一,寺庙西侧的藏巴堂平面呈“凸字形”,内室为方形,外围也附有转经道。转经道的设置可能也是源于对绕塔或绕佛礼拜方式的模仿。虽然后来在修建寺庙时转经道已经没有了,改成在建筑外有一圈环绕的小路,但是转经礼拜的模式却被世代继承下来,并成为藏传佛教中最为常见和基本的宗教仪式。

佛教对于这一时期的吐蕃而言,是一种完全新兴的外来文化,自然就不会有寺庙这样一种建筑存在,所以模仿佛教昌盛地的寺庙修建自己的寺庙成为了首选的方式。一方面,外来的传播者倾向于营造自己熟识的佛教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吐蕃学习外来文化的一种便捷途径。

二、发展期(公元10世纪—公元15世纪)

郎达玛灭佛后,佛教在西藏一时销声匿迹。公元10世纪,佛教又再度发展兴盛起来,并且与藏族文化、苯教文化进一步有机融合,逐步发展成了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藏传佛教。同时随着各人对显、密宗教法的理解和偏重的差异,教派分支开始出现。影响力较大范围较广的主要有四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噶当派。公元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萨迦派大师八思巴为“帝师”,佛教僧侣们的最高领袖,同时掌管释教总制院,管理西藏相关事务,“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史》卷202《释老传》)。从此揭开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序幕,也正从此时开始,中央王朝对西藏有了更明确的控制权,汉地建筑开始更多地渗透到西藏寺庙建筑的修建中。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萨迦派主寺、八思巴大师的驻锡地——萨迦南寺。

萨迦南寺始建于公元1268年,是“帝师”八

思巴委托当时的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主持修建的,作为八思巴返回西藏之后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场所。萨迦南寺内的建筑主要有拉康钦莫大殿、八思巴殿、吉济拉康、则庆拉康等。《汉藏史籍》中记载,本钦释迦桑布“向当雄蒙古以上乌斯藏地区各个地方的万户和千户府发布命令,征调人力。于次年为萨迦大殿奠基,还修建了里面的围墙、角楼和殿墙等”^{[6]234}。萨迦南寺有一套完整的围合体系,建筑群外设有两套城墙:内侧的护城墙由夯土筑成,坚实牢固,城墙外侧倾斜坡度很大,不利于攀爬;城墙四角有高耸的角楼(见图2),并且设有垛口和向外凸出的马面墙台,进一步提高了防御效果;外城墙是一道低矮的呈锯齿状的养马墙,平时用于养马,战时可以作为比较简单的防御工事;城墙外是护城河。拉康钦莫大殿作为萨迦寺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建筑,也是由高厚的外墙保卫,立面上基本不开窗,去往二层、三层的通道也仅有一个入口,又高又陡,易守难攻。由护城河、内外城墙和角楼组成。可以说萨迦南寺是一座坚固的城池,这样的寺庙围合方式在西藏是唯一的,因而,很多研究者认为,萨迦南寺的建造明显受到了汉地造城理念的影响,带有一些封建集权的寓意。



图2 萨迦南寺的角楼

创寺于公元1087年的夏鲁寺是一座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寺庙,该寺虽然始建于后弘期早期,但是真正的发展时期确是元代萨迦派掌权时期,因为当时的夏鲁寺主与萨迦派掌权者之间的

亲属关系而使得寺庙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寺庙的扩建维修都集中了当时汉、藏两地先进的营造工艺,风格上也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夏鲁寺的主体建筑有三层,一层主要是集会大殿和若干佛殿;二层主要是南、北、西三座无量宫佛殿、东面的般若佛母佛殿和四角的配殿,建筑布局在四周,中间形成一个被围合的天井;三层只有东无量宫佛殿。对于这样的做法,尤其是二层的平面布局存在这样的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受到了汉地院落建筑做法的影响,四面的佛殿围合中间的院落,中轴对称,均衡布置;一是认为延续了吐蕃王朝时期寺庙建筑对理想佛国世界的构想,东南西北四座佛殿象征宇宙海中的四大洲,中间的庭院是虚化的须弥山。不论当时修建者的意图究竟如何,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夏鲁寺的平面布局形式既是对早期做法的继承,也是接受新思想发展新形式的过渡。

从郎达玛被弑到13世纪中叶萨迦王朝的再度统一,近400年的时间里西藏一直是处于分割割据时期。佛教徒们通过宣扬因果报应摆出救民于水火的姿态,同时也利用宗教的“道德”规条去帮助统治者巩固政权,但是不同于吐蕃时期的是,此时的佛教徒们已经明白了单靠统治阶级的支持是不足以获得长久的发展,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才是唯一可靠的途径。寺庙就成为他们猎取更多信誉的物质载体和象征。所以,吐蕃时期寺庙的规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藏传佛教发展的要求,“前堂后殿”或“前堂侧殿”的形制格局开始形成。这里的“堂”指的是集会诵经时使用的经堂;“殿”指的是供佛参礼的佛殿。由于佛教徒的迅速增加和信众的日益增多,狭窄的佛殿已经不能满足僧侣集会和修行的需要,大体量空间的“经堂”应运而生。从公元11世纪起到公元14世纪,阿里、蔡巴、萨迦、帕竹等方面多次对大昭寺进行了维修扩建,并在原来僧房院天井部分增加了多根立柱变为室内的多柱空间,用以满足集会的需要,大昭寺的建筑平面遂变成了“前堂后殿”的格局。江孜白居寺大佛殿平面采用了坛城的十字形状,建筑正中是48根立柱的大经堂,除了南面另外三面均建有佛殿(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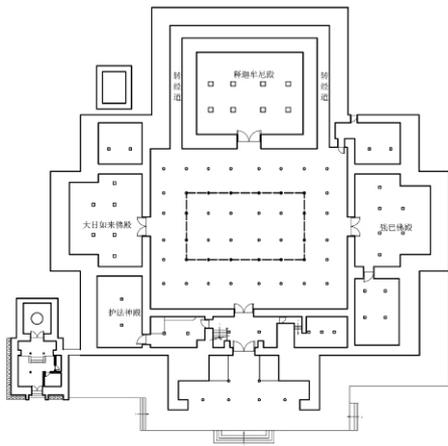


图 3 白居寺平面图

公元 15 世纪,随着藏传佛教信徒的不断增多,原有的室内转经道已经不能大批量信众礼拜的要求,大昭寺开始将转经道迁至室外。今天,在大昭寺有三圈转经道,室内转经道仍然保留,但已不再大规模开放;围绕整个寺庙的外圈形成了第二圈的转经道;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八廓街成为了环绕大昭寺的第三圈转经道。之后,各大寺庙纷纷效仿大昭寺的做法,将重要殿堂的室内转经道迁至室外,时至今日,信徒们已经习惯了围绕整个建筑甚至建筑群转经礼拜的方式。

这一时期的寺庙建筑,由于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更加密切,所以仍不可避免的对汉地先进技艺的学习,而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从平面形制上看已经不明显。同时,由于佛教的本地化,寺庙建筑形式也顺应发展要求逐步有了完整的雏形。大体量多柱空间的出现满足了藏传佛教扩张的要求,也促使“前堂后殿”、“前堂侧殿”的平面形制的产生,可以说这是西藏寺庙本土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磨合时期。

三、成熟期(公元 16 世纪—公元 19 世纪)

公元 1409 年,改革派大师宗喀巴在拉萨创立格鲁派并建立了自己的驻锡寺——甘丹寺,此后,格鲁派逐渐取代日渐衰败的噶当派,成为了新的四大教派之一,由于其对噶当派教义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也被称为新噶当派。虽然宗喀巴大

师领导的格鲁派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仍不能避免的陷入教派纷争这个大漩涡。公元 15 世纪下半叶,教派受到来自后藏的噶玛噶举派势力的压制,很多格鲁派寺庙被迫改宗其它教派,格鲁派的僧人甚至不能参加每年正月在拉萨举办的传召大法会。直到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积极促进格鲁派与蒙古贵族的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这样的局面才有所好转。公元 1642 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在厄尔特部首领固始汗的支持下打败了藏巴汗和噶玛噶举势力,在拉萨哲蚌寺建立了地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这个政权名称被一直沿用,直到西藏地区和平解放。此后,由达赖喇嘛领衔的格鲁派得到了来自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藏区最有实力的宗教团体。与此同时,藏传佛教的地位如日中天,教义教理的传播更加系统化。作为宗教传播主阵地的寺庙建筑也逐步成熟,有了自己固定的建筑形制,成为具有藏族特色的重要传统建筑类型。

宗喀巴大师对于经文学习程序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为格鲁派建立完善严整的组织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逐渐将这种带有等级色彩的管理组织体制发扬到了其它的藏传佛教教派。一个完整的寺庙体系一般包括措钦、扎仓、康村这三个主要级别,它们之间是层层隶属的关系(见图 4)。这种等级特点也能通过建筑平面形制体现出来。等级较高的建筑中经堂规模较大,面积一般在 60 柱以上,重要的佛殿外还保留了转经道的做法,例如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内措钦大殿北面的三世佛殿就保留了部分室内转经道;“前堂后殿”的做法成为主流形式,经堂后部多并列有三间佛殿,规模较小的建筑中可能仅有一间佛殿;等级较低的建筑只有经堂没有佛殿,在经堂的尽端摆放佛像或其他供奉物代替佛殿。

寺庙中最主要的大殿建筑的平面形状以方形为主,十字形坛城平面的做法已经比较少见了,有的修习密宗的寺庙或扎仓还采用这样的做法。建筑平面常被分为三段式。最前端的是入口处的门廊,形状多为方形或“凸”字形。中间是面阔较大于进深、多柱林立的经堂,通常正中若干排立柱会升起到两层高,这种做法在 15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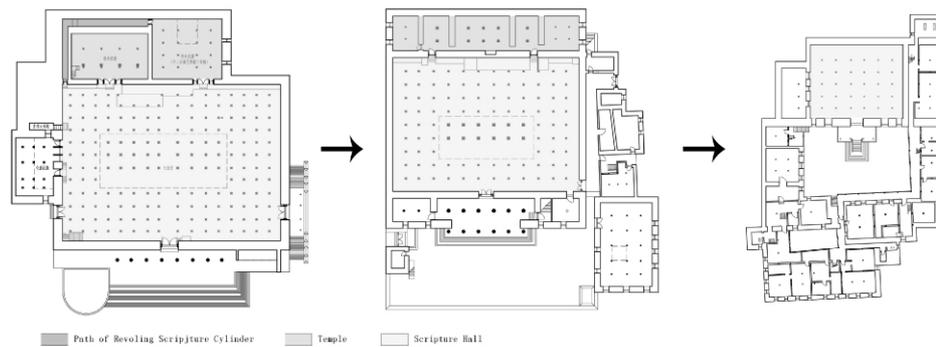


图4 寺庙中不同等级建筑的平面

之前是不多见的,疑有两种可能:一是大昭寺中心佛殿天井覆顶后就采用了这样的做法,便于室内采光,后来的寺庙修建纷纷模仿大昭寺也使用了类似的做法;二是藏传佛教活动中,转经是最基本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宗教活动,“都纲”平面形式正是适应了这样的活动要求,利用中间高起的空间与四周低矮阴暗的转经道形成区分。最后段的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佛殿,佛殿一般为方形,建筑面积多在2—8柱间。从室外到门廊到经堂到佛殿的地坪是逐渐抬高的,建筑内部的空间也极富变化,时高时低,时明时暗,烘托了寺庙内神秘的氛围。

四、小 结

从公元7世纪至今,寺庙建筑从无到有,逐

渐成为藏式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从建筑平面形制上来看,吐蕃时期的寺庙建设主要是对外地寺庙尤其是印度寺庙的模仿以及对理想佛国世界的憧憬;佛教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再度兴起时,开始意识到扎根于民的重要意义,逐步将本土意识加入到寺庙建设中来,为了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扩建寺庙,而不再是单纯的模仿;也由于与内地中央政府的关系,对汉式建筑有了更多一些的学习模仿;格鲁派巩固实力后,藏传佛教进入了全盛阶段,不仅是在西藏地区、藏区甚至在全中国范围内都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寺庙建筑的形制也日趋定型化,摆脱了之前浓重的模仿痕迹,成为了完全藏传佛教化了的独立的建筑。

参 考 文 献

- [1]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 拉萨:西藏社会科学会,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
- [2]索南坚赞. 西藏王统记[M]. 刘立千,译注.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 [3]宿白.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4]拔塞囊. 拔协译注[M]. 增补版. 佟锦华,黄布凡,译注.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 [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M]. 陈庆英,译.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